

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他的诗不但影响着宋一代,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可以说,苏轼身上体现着典型的宋代文化精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罗衡卫在做客国学讲座时,分期对此展开论述,从中揭示了宋代科举中的一些故事及“秘闻”——

嘉祐二年贡举,为何被称科举史上第一榜？

■本报记者 许珂



罗衡卫

嘉祐二年（1057），年仅 21 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随后在殿试中，苏轼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仁宗的赏识。苏轼身上体现着典型的宋代文化精神，近日，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罗衡卫在做客国学讲座时，分期对此展开论述，从中揭示了宋代科举中的一些故事及“秘闻”。

苏轼试卷被误以为是曾巩的

关于苏轼的科举，有一个典故说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对一份卷子非常欣赏，有意把他定为第一，但又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就定为第二。后来才知道，这份卷子不是曾巩的，而是苏轼的，于是,苏轼以第一名的水平得了个进士第二名的结果。其实，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是后人想当然编的。真相是，苏轼连前三名都没进，只是中了进士乙科，而且名次也不好。前三名是谁呢？第一名是章衡，第二名是蹇卣，第三名是罗庠，第四名是郑雍。

史书记载：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那这段文字是不是意味着苏轼考了第二名呢？不是的，因为史书接着写：苏轼“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得从当时的进士考什么、怎么考、怎么

评卷说起。

当时，进士考试不是一篇文章定功名，而要通过礼部的省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合格才能金榜题名。礼部考诗、赋、论、策和帖经，殿试一般只考写作诗赋。礼部的考试，第一场考写作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策”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的申论），第四场考“帖经”（“帖经”考的是出自《论语》的填空题、出自《春秋》或《礼记》的简答题）。苏轼参加贡举考试，只取得了第三场“策”试的第二和第四场“帖经”第一。所以，笼统地说，苏轼礼部考试得第一或第二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他考进士考了第二名。

为什么欧阳修把苏轼的试卷误会是曾巩的呢？因为，他看到的试卷不但没写考生名字，也不是考生写的，而是考官抄写的。这还得从阅卷的程序说起，宋朝的进士考试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有严格的防作弊程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由专人收集考生的试卷，编排序码，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的地方封住；第二步，封好考生信息的试卷交封弥官重抄一遍，并盖好御书院的印章；第三步，将誊抄好的试卷交给考官阅卷定等级名次；第四步，将考官评了等级的试卷封好，送给复考官评等级；第五步，由编排官查阅试卷等级，考官和复考官评的等级不同的试卷，要重



新评定等级，再评的等级还是不同，则取相近的等级。阅卷期间，欧阳修等主考官、副考官、考官等人都不能回家，不能和外界联系，只能呆在阅卷的院子里。如此严密的程序，让评卷的考官无法看到考生姓名，无法看到考生本人的笔迹，不可能知道试卷是谁写的，欧阳修将苏轼的文章误成是曾巩的文章，这在情理之中，很正常。

殿试成绩出来了，苏轼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福昌主簿”，从八品，比一般进士授从九品、正九品官职要高。由此，可以推断苏轼在几百名进士及第的人中排名靠前。

嘉祐二年贡举群星闪耀

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嘉祐二年贡举录取的进士可谓是群星闪耀，其中有不少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榜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榜并不过分。

这一次考试，一是有豪华的考官阵容。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副考官是王珪、梅挚、韩绛、范镇，这四位都是当朝文学名家。其余的考官和工作人员也都是馆阁文臣；二是这一榜进士能人最多，集中了神宗、哲宗两朝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学、经学各方面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宰相就出了 9 名，文学家好几个，文武双全的人也不少，《宋史》里有传的就有 24 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这一榜里。

文学巨星在嘉祐二年贡举中显得格外耀眼，不但影响了大宋，也影响到了后世，甚至亚洲儒学圈。从明、清所编的大量宋代诗、词、文选本就不难看出，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的诗、词、文，成了南宋、元、明、清学习的典范。并且早在宋神宗时期，欧阳修和苏氏兄弟三人的文章就已传到倭国和高丽，

并收获无数粉丝，高丽大臣金颙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金富修、金富轼、金富辙。

苏氏兄弟影响力这么大，那一榜的状态章衡呢？苏轼说章衡这个人，近一百年来都没有人比得上。章衡被派遣出使辽国，辽道宗耶律洪基欺他是文士，故意在酒宴时提出要章衡射箭助兴，想借此羞辱大宋使节，出乎耶律洪基的意料，章衡射出的两箭都中了靶心，大长了赵宋的志气，灭了辽主的威风。回京时，章衡向皇帝反映辽国没有戒备，此时出兵可收复山后八州，但未被采纳。苏轼的这位科举同年，还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原来，苏轼来杭州任官时，章衡要求苏轼治理好西湖，苏轼领命，按照章衡的要求修筑了一条长三公里的大堤，并成为西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在治理过程中缺人缺钱缺物，苏轼于是向章衡写信要求他出资派兵派船，章衡一一应允，这才让著名的苏堤得以完成。

在经学方面，那一榜的进士张载创立了关学。张载二十岁时就写了《边议九条》，庆历元年，他从长安跑到延州（今延安），求见当时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并提出要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范仲淹大为赞赏，但范仲淹认为他是做大儒的人才，就劝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叫他要不要研究军事了，去研究儒家经典。张载饱读儒家、佛家、道家经典，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于是，37 岁的张载进京参加嘉祐二年的贡举。作为哲学家，张载建立了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同时，张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他认为宇宙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由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组成的旋转运动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远远超过西方科学家的“日心学”。

国学教育

古代辞赋为何偏爱器物之美？

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无论大赋还是小赋,都重视在作品中呈现器物,由于“赋”与“物”的亲密关系,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凡文人雅趣之所至,多有题咏

器物是日用之物的总称，与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一方面极为关注器物的制造与享用，追求便利与精工；另一方面又思考附着于器物之上的欲望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是肯定的态度；《尚书·旅獒》曰“玩物丧志”，《传》曰“以器物为戏弄则丧其志”，这是警惕的态度。历史发展表明，只要调和得当，必能彰显器物之功用。器物因其自身的魅力，成为一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文赋》称“赋体物而浏亮”，《文心雕龙·诠赋》谓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无论大赋还是小赋，都重视在作品中呈现器物，《历代赋论》相关分类可见其大略。再者，由于“赋”与“物”的亲密关系，同题壁、题画如出一辙，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凡文人雅趣之所至，多有题咏。皇甫谧《三都赋序》论及赋的修辞特征“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器物与辞赋的联姻，是“物之魅”与“文之美”的结缘。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然而“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刘熙载《艺概·赋概》），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

追根溯源，数陈器物材料

枚乘的《七发》有一节专写音乐，重心落在“琴”上：“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鹍黄鹄鸣鸣焉，暮则羝雌迷鸟宿焉。独鹤晨号乎其下，鸚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析以为琴……”古人以桐木为琴，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因此本段文字先写桐之特征、所处环境以及在大自然中所受到的熏陶，共同造就了材料的与众不同，然后才由琴挚斫木为琴，接着进入到演奏的阶段。琴在汉代极受贵族、文人士大夫喜爱与好评，桓谭的《新论·琴道篇》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汉末蔡邕流亡在外，“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由焦尾琴的典故，既可见选材之难，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后汉书·蔡邕列传》）。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嵇康《琴赋》甚至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无论枚乘还是嵇康，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材料的生长环境，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并且用辞赋这种文体将其纵横铺排出来。古人相信万物秉天地而生，器物的制作与使用都要遵循原材料之性理，赋之铺排是对器物性理的原始追溯，契合于自然之道。

曲尽其妙，提升器物品格

唐代名臣李德裕曾于扇上作《画桐华风扇赋》，其序曰：“成都岷江，矶岸多植紫荆。每至春暮，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华，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雨飞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缣于素扇，以赉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扇上。”华即花，据《太平广记》载，蜀地有“乌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俗谓之桐花鸟”，因其特征与凤凰近似，故又称为桐花凤，外形小巧美丽，古人将之视为祥瑞。李德裕曾任西川节度使，治所在成都，故对桐花凤较为熟悉。赋以扇为描写对象，而扇之上有鸟，全文先写鸟之高洁，称其“独美露而爱桐，非人间之羽翮”，既而针对班婕妤《怨歌行》（即《团扇诗》）的哀怨以及传统的美人、蝉雀主题扇面，作者认为“未若缣兹乌于珍簪，动凉风于罗荐。非欲发长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嘒”，扇用以消暑，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与班氏哀怨天凉“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不同的是，作者说，“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扇有了更高的价值，其品格得以升华。唐玄宗时张九龄曾因获赠羽扇作《白羽扇赋》，以“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篋中”作结，而前文“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之何忌”一句可谓掷地有声，元代赵孟頫纨扇赋曰“苟行藏之任道，愿俟时乎安之”，都已脱离宫怨，注入沉雄之气，在反复铺排中，烘托、抬升器物的气格。

争奇斗巧，广纳异域器物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

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在汉末，曹丕曾作《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迷迭赋》《玛瑙勒赋》序文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玛瑙，玉髓类矿物，中国当时亦有出产，只是数量不多，因此多从西域传来。《车渠椀赋》序文：“车渠，玉属也，多纤维缠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车渠，原为海中大贝，可玉化，硬度高，能用以制作各种器皿，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均有出产。《迷迭赋》正文：“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迷迭草，鱼鲛《魏略》云“大秦出迷迭”，原产地中海沿岸，能制香。玛瑙勒、车渠椀、迷迭香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及至明清，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清初李光地作《眼镜赋》、纳兰性德作《自鸣钟赋》，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平常之物，然确非中华旧有，故能引起文士之兴趣。新器物、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进入作品，赋予辞赋新的生命。清末章钰馨的《电报赋》对电报技术的“一刻千程，纵声万里”大为惊叹，文中大肆想象其运行、传输机制，既有科学价值，也有文学美感。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一切特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带来奇趣，更添新知。

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兴于先秦而盛于两汉，北朝魏收说“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直至唐宋以后，由于“赋兼才学”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赋在科考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据《光明日报》）

胡文璧：刚正不阿，不畏权贵

胡文璧（1460—1523年），字汝重，号石亭，明代衡州府耒阳人。二十岁考上进士，当上了户部主事，后任员外郎。胡文璧为人干练通达，处理问题果断，办事迅敏。正德四年（1509年），由正郎改任浙江监察御史，专门纠劾文武官员中违法有过失的人，肃正纪纲。胡文璧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两浙官员欺民的案件少了很多，百姓受到实惠，对他可谓是感激万分。任满，朝廷因胡文璧在任期内表现良好，升他为太常太卿。正德八年（1513年），胡文璧父亲去世，他着急赶回家去奔丧。丧期满后在凤阳任职。在凤阳，他着力清除旧时的弊端，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关注民生，抚老育幼，实行一系列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一年后，调守保定，凤阳百姓感其

恩德，不舍其离去，攀留者超过万人。

在保定任职不满半年，胡文璧又调任天津兵备道副使。之后他曾三次上奏章辞官，想急流勇退，全都不被允许。不久，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上《禁革皇庄疏》（皇庄是明代皇室直辖的田庄），果不其然，触怒明武宗朱厚照，被锦衣卫拘捕，受尽苦楚。出狱后，贬谪为延安府检校。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继位，又重新起用他为四川按察使，但未上任就病逝，时年五十七岁。著作有《文会录》《耒阳遗迹》《耒阳十景诗》。

（本报记者翟瑜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国学人物

1

被遗忘的墨学专家宗真甫

《墨学与抗建》是宗真甫这唯一一本传世的墨学著作。从《墨学与抗建》中可以看出他对墨学研究之深及其哲学造诣之厚，可惜如今连国图也没有《墨学应用论》或《墨家谈辩》，在学术资源网站上也找不到一篇写他或他写的文章，甚至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被世人遗忘了。

宗真甫（1898—1974），河北沙河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赴法国里昂大学学习，翌年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青年团旅法支部组织部和宣传部主任。因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被法国当局驱逐至德国，后辗转至比利时列日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并被吸收为联共（布）党员。1928年春，他被党组织派遣回国工作，在北京秘密活动几个月后，因病与组织脱离关系，此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

宗真甫1933年任北平中法大学秘书，翌年被派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担任秘书、校长，1939年回国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

抗战军兴，此时宗真甫身在里昂，报国无门，非常苦闷。他是研究哲学的，又服膺墨子学说，他从《墨子》鲁问篇得到启

发，“以救国不在形式，端在尽其所能。予以研究哲学者之资格，能发挥一种学说，以激励国人，提高抗战意志，帮助精神动员，也算贡献了个人一点微薄的力量。”他原拟将多年研究墨学的心得写成《墨家谈辩》一书，该书第十卷为《墨学应用论》，内中共有十篇，与抗战有关者四篇。为了赞助抗战，他提前在1938年用一周的假期将前三篇写出，因为“我们既是全面抗战，便应将人力物力完全施展出来。人力之中，精神力量尤为重要。……举凡历史上之道德理论英勇义行，无不发挥他固有的大力，以增添抗敌之勇气。唯墨家一派，仁义智勇，才德兼备，摩顶放踵，旷世寡传，乃竟无人特为提倡，以励士气，坐令此宝贵之教训，湮没不彰，而吾民族道德上之沉痾，亦竟难根本改造，你说可惜也不！”1939年回国后完成了第四篇，1940年托贵州印刷所付印。该书取名《墨学与抗建》，即《墨学的抗战建国论》之缩写。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墨学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该书采用了白话对话体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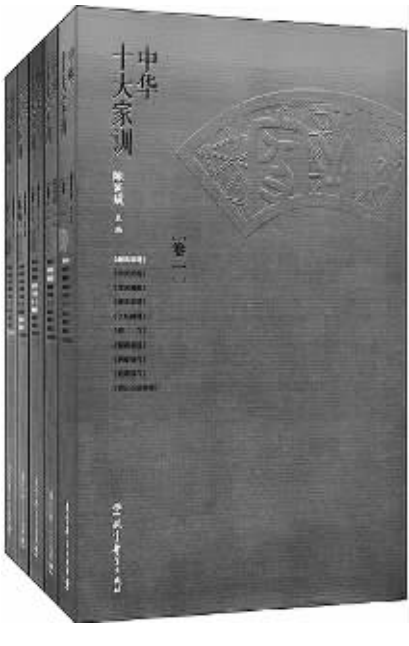
宗真甫1952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唯物辩证法、形式逻辑、中国语法文法、墨家哲学等学术研究，“文革”中受批判，1974年去世。

（据《中华读书报》）

国学荐书

1

《中华十大家训》



陈延敏教授致力于家训文化研究已有近三十年时间，是当前国内重要的家训研究者之一。其早年与徐少锦教授合著的《中国家训史》如今已成为家训研究不能绕过的重要著作。近年来，他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

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由其担纲成立的江苏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家文化研究院渐已成为全国家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这部五卷本的《中华十大家训》，就是其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之一，也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家训文化读本。